

不幸な歴史に面することも出来ると固く信じる。また、政治、歴史、社会心理、医学などの手段を利用し、違う形で、政界、学界、民間、とくに若者たちと交流すれば、中日間にあるトラウマを癒すことが出来、中日の新時代を迎えることが出来ると信じている。

皆で頑張ろう！

## 历史创伤的治疗：中日关系无法跨越的课题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

### 一、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幸存者精神创伤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幸存者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和战后的生存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精神创伤上的表现事实上也有很大差异，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他们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在笔者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下列三种类型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

精神分裂型。在笔者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黄玉英老人可算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黄玉英（化名），女，1926年生。1937年6月，她和父亲等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12月13日，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口时，被日军遇见，日军并用刺刀戳她父亲的胸部，又用枪托砸她父亲的头部，她父亲便倒到地上，脑浆也流了出来。黄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她，并帮助她上学。在大屠杀期间，对于失去父亲的黄玉英而言，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见人整天提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后来她到我们学校向我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她说她要将华小姐的照片挂

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不幸的是，后来她挂在家中的华小姐照片不见了，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我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说：“小偷把华小姐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另外，她到了晚年之后，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过日，一室一厅家里几乎全部被垃圾塞满。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她所捡的垃圾全部堆在一室一厅的家中。后来由于她的精神几乎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居委会便将她送进养老院。黄玉英老人到了晚年之后，正常人已很难理解她的思维，从1999年到2002年，在我所调查的幸存者中，我去看她的次数最多。后来我的研究生许书宏也曾多次去看望过她。

自我封闭型。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幸存者姜秀英（化名）1925年出生，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她告诉我们说：“夜里经常做噩梦。有时那种情景还会出现在梦里。我现在不想听到门外的脚步声，我很害怕。所以我一人在家时，就把门开着。我对‘脏’也特别敏感，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好事情，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的女儿（养女）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去看望过她三次，每次去我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2003年她因病去世，三天后我到南京石子岗为她送行，她的养女可能至今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母亲的悲惨故事和她内心的创伤。事实上，在调查中，笔者为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她）们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我们的访谈。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

神经质型。在调查中，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1999年9月我去采访下关一位幸存者蒋秀英老人（化名、1923年出生），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她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另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

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会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会出现连续几天睡眠不好。最近几年来，新闻和影视方面的记者采访幸存者的密度相当高，络绎不绝，他们的采访在无意中加重了这些幸存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从表面上看，大部分幸存者同普通人并无区别，人们很少能有机会或很难去体会感受他（她）们的内心世界；在南京由于缺少临床医学专家对幸存者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人们就更难了解幸存者精神创伤的各个层面。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一些幸存者如李秀英、夏淑琴、姜根福、常志强等人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采访调查，为历史作证。在她们内心深处，她们也试图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共享她们悲惨的记忆。还有些幸存者如张秀红老人，笔者去采访她时，她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成功地找到了抚慰其创伤的“藉口”：一是她的丈夫赵广福在有生之年非常能够理解她精神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这却因此救了爷爷的一条命。

## 二、战争创伤的延续影响

9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已开始演化为中日关系之间重要问题之一。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开始日益深入，在研究历史事实本身的同时，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悲剧和暴行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它不仅在肉体和精神上持续折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而且影响到当今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甚至也给两个不同民族普通民间的交往带来了心理阴影。

作为生活在南京的每一位普通市民已无法回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已日渐积淀成为南京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在南京，作为公共记忆的场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每一处纪念碑随时都可以带您缓缓走进创伤历史的深处。位于南京大屠杀遗址江东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设计一些大小相间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将空间进行分割与重组，同时陈列展示了遇难同胞遗骨遗物、图片、文字等历史史料，空间和特定实物的有机组合，共同形成了空间象征建构。纪念馆作为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人们进入这个公共空间，理解空间的象征意义，社会记忆深受其影响。同时，清明节祭扫亲人之时，许多市民自发前来凭吊，每年12月13日，政府在纪念馆举办形式多样的悼念仪

式，民间和官方的仪式活动又不断强化空间象征，实现对空间的再建构。这一特定空间与仪式的互动强化了受众的社会记忆。

除了有形的纪念性建筑物之外，许多无形的因素也会激活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从而启开创伤记忆的通道。任何与南京大屠杀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相关联的现实事件，事无巨细无疑都会触及南京市民敏感的神经。自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后，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却不绝于耳，日本右翼甚至公开集会叫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并通过电影、法庭试图为南京大屠杀案的战犯翻案。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行再次揭开南京市民心中尚未痊愈的伤疤，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再次成为南京市民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随时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1995年3月，当南京市发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捐赠一元钱的倡议后，南京市民纷纷踊跃响应，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捐款的市民达到100万人，捐款总额达到160余万元。2000年12月，当盛岛酒店拆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而为市民获悉后，立即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对。2002年3月，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更名讨论，也在市民中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公共记忆场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它们无疑已成为南京市民凭吊缅怀遇难同胞的神圣象征和市民创伤记忆深处的一种情感寄托。2006年12月10日晚，南京东大设计院一位39岁的某老总私下花费五万元雇请数十临时人员对南京市区内日产小汽车进行喷洒，并张贴告示宣传抵制日货，还让车主前往江东门纪念馆附近一家汽车修理厂清洗，并为车主提前支付了清洗费用，每车清洗价格为8元。因有受害车主拨打110报案，很快为南京公安所查获并制止了此事的扩大和蔓延，避免了一场外交风波。

由于南京媒体的强势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京大屠杀”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自1986年至2004年，主流媒体《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共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达800余篇，其中90年代中后期呈迅速上升趋势，其中有些年份其报道数都在百篇之上。其报道主题最初比较集中在新资料发掘和新人证的发现方面，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90年代中后期后，其报道主题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例如有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新成果、南京大屠杀有关电影、日本老兵的忏悔和关爱幸存者等各个方面，南京媒体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问题的报道上越来越

表现出理性的态度。

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两者相互缠绕，共存共生。

### 三、迟到的课题：医治战争创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行，另一方面由于1949年之后，社会各界未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未能对幸存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因此，当日本右翼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后，南京学界才开始重视幸存者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侧重于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其调查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而幸存者则常常被当作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遗憾的是我们将幸存者当作历史证人角色的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沿续到21世纪的今天。事实上，现有历史资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客观存在，我们今天来反省这段历史时，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让这些不幸的幸存者仍一次次来充当我们反击日本右翼的武器。我们应该到了改变我们旧的思维模式的时候了，应更多的从人性关怀的视角来着重解决如何医治这些幸存者战争创伤的问题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对社会（战争）幸存者精神创伤的调查研究与医治早已引起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关注，社会各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社会治疗与研究几乎从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的视角已触及到幸存者的感情失调、幸存者的家庭认同、幸存者的慢性反应，甚至有很多成果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第二代的影响，在临床治疗方面，他们也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先进的社会治疗方案与措施。由于受到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现阶段人们更为重视进行物质援助，而很少关注精神治疗，或者说我们尚不知如何着手进行精神治疗。现在经历过战争的南京大幸存者人数已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局限，能够接受战争创伤治疗的幸存者也会越来越少了。顺便说一句，不仅战争的受害者需要创伤治疗，实际上，那些参与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到了晚年也面临战争记忆的折磨，他们心理危机也应引社会心理学专家的关注。

众所周知，战争的阴影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战争经历者的消逝而主动消失，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年轻人在年轻人中重新激活战争记忆，从而导致

新的战争的爆发。因此，医治中日之间的战争创伤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幸存者和受害者而言的，而更应放大到我们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群体。几年来，中日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互访和研讨的机会越来越多，通过不断互访与对话，加深了双方的理解。本次由日本立命馆大学的村本邦子教授、美国加州综合学院的阿芒德·沃卡思教授、笠井绫博士和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追忆南京 2009”中日 HWH 工作坊也极具深远意义，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地近 30 名师生，一起参观战争纪念馆、聆听幸存者的记忆、演出戏剧、研讨对话等不同活动，大家敞开心扉，交流感受，表达和平追求。参加者从内心中深切感受到了放松，彻底丢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完全达到了 HWH 工作坊开营的目的。

最近，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已有很多人认识到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性，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日前也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建构，并倡议设立东亚共同历史研究的课题，将过去战争的创伤转化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宝贵财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从心灵深处进行相互对话，坦诚相待，共同面对过去的历史，借助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采取不同形式，加强政界、学界、民间特别是年轻人的交流，我们就有信心来治愈中日之间的战争创伤，就一定开拓中日关系新时代。

大家一起努力吧！

## **Healing the Trauma: The Unavoidable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Lianhong Zhang, Ph.D.**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 **1. Nanjing Survivors' Psychological Trauma**

Compared to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issue of Nanjing survivors' psychological trauma has been rather neglected. Social services and treatments for the survivors have not been readily provided. Their reported experi-